前言

戴爾·喬根森 (Dale W. Jorgenson) *

劉遵義教授的這部論文集，對於自1978年鄧小平啟動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在過去40年中保持近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提供了全面而細緻的探討。本書首先針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來源提出分析，包括有形資本積累、教育水平提升、規模經濟效應與技術進步等。令人詫異的是，技術進步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相當有限。

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來源的分析，本書得出了對習近平主席倡導的中國經濟發展「新時代」的未來展望。儘管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開始下滑，但速度依然快於歐洲、北美和亞洲的發達經濟體。後續內容涉及1990年代後期的亞洲金融危機，以及中國對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後引發的美國經濟危機的應對。

接下來，本書探討了中國政府通過「雙軌制」等措施，推動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所採用的經濟策略。雙軌制的關鍵是在保留中央計劃制度的同時，發展出越來越廣泛的市場。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讓中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有妥善管理的外國投資開放。本書在最後部分對中國經濟的長期前景提出了展望，並就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的後果作了最新的討論。

* 戴爾·喬根森教授(1933–2022)為美國哈佛大學莫理斯校級講座教授。

針對本書標題中的疑問——中國經濟是奇蹟還是泡沫——作者給出了回答。中國經濟的非凡表現出人意料，但其持久性表明這絕非泡沫。中國經濟的增長可以用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解釋：資本積累、勞動力素質提升和規模經濟效應等。這說明中國經濟的增長儘管極其出色，卻也並非奇蹟。對理解中國經濟在過去、現在和未來的發展而言，本書都將是不可或缺的寶貴參考。

2018年12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

自序

在抗日戰爭（1937–1945）臨近結束的1944年，我出生於中國貴州省遵義市。當時我的父母為逃避日本軍隊，正從桂林前往陪都重慶。貴州在那時和如今都是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我兩歲的時候，全家從重慶遷居香港。我在香港上幼稚園，接受小學和中學教育，直至1961年作為新生入讀美國史丹福大學。此後又過了40多年，我才重新成為香港居民。1966至2004年，我以史丹福為家，之後回到香港，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一職。

在史丹福上大學的第一年，我選了時任《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主編的約翰·格利（John G. Gurley）教授的經濟學入門課，所用的教科書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 A. Samuelson）教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格利教授是一位傑出的老師，薩繆爾森的課本則語言清新且邏輯嚴密，這促使我下定決心，在研究生階段從物理學轉向經濟學專業。後來成為我的博士論文導師的戴爾·喬根森教授做出了錄取決定，於是我在1964年成為了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系的一名研究生。

1965年的某一天，我接到史丹福大學經濟學系的負責人愛德華·肖（Edward S. Shaw）教授的電話。在本科時期，我曾上過他講授的一門貨幣及銀行學課程。他給我提供了在經濟學系擔任代理助理教授的職位，專門研究中國經濟，但在第一年裏無需講課。在沒有充分意識到自

己將面臨什麼的情況下，我接受了邀請，結果是把接下來近40年的光陰都留在了史丹福大學。由於學校的安排，加上自身的背景，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尤其感興趣，並著手開展這個領域的深入研究。1966年，我利用自己所能收集到的各種東拼西湊的數據，建構出可能是首個關於中國內地的經濟計量模型，那是一個純供給側的模型。

我成年之後對中國內地的首次訪問發生在1979年，就在中國決定改革開放後不久，成為美國經濟學會發起的第一個美國經濟學家代表團的成員。我們一行十人，由如今已故的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R. Klein)教授率領。代表團中還包括1972年的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J. Arrow)教授，以及哈佛大學的中國經濟問題專家德懷特·帕金斯(Dwight H. Perkins)教授。接待方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我們訪問了北京、長沙、南京、上海、武漢和西安，並受到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的接見。我們還會見了多位中國經濟學家，如北京大學的陳岱孫教授、中國科學院的陳錫康教授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許滌新教授等。那時候，汽車在中國的大城市裏非常罕見，而自行車眾多；商店的數量很少，貨品稀缺；每個人都穿著大同小異的藍色外套。旅行結束時，有人邀請我們對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率做一番預測。借用自己的簡單的供給側計量模型，我給出了8%的數字，是代表團中最高的——最低的預測值僅為1%。但結果表明，中國經濟在過去45年中的年均增長率超過了9%！

1980年夏，我再度訪問中國內地。此次是作為教員之一，參與克萊因教授與中國社科院在北京聯合舉辦的為期七週的計量經濟學講習班。這場活動的其他教員包括：史丹福大學的安德森(T. W. Anderson)教授、賓夕法尼亞大學的阿爾伯特·安藤(Albert Ando)教授、普林斯頓大學的鄒至莊(Gregory Chow)教授、當時還在多倫多大學的蕭政(Cheng Hsiao)教授，以及紐約城市大學的粟慶雄(Vincent Su)教授等。講習班的舉辦地是頤和園昆明湖中一座小島上的龍王廟。我們面對來自中國各地的100名學員，其中許多(例如王春正先生和李泊溪女士)後來成為中國經濟改革成功事業的重要貢獻者。我們還受到了姚依林副總理的接

見。這次訪問的一項成果是，中國社科院決定創建一個計量經濟學研究機構，即後來的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

1986年，鄒至莊教授組織了四位華裔美國經濟學家訪問北京，為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當時由趙紫陽總理兼任主任）提供建議。成員包括費景漢（John C. H. Fei）教授、顧應昌（Anthony Y. C. Koo）教授、鄒至莊教授與我，均為臺北的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我們向體改委及其副主任安志文先生介紹了臺灣經濟發展的經驗，尤其是在經常賬戶開放過程中採用的外匯交易憑證制度。我們還被委派了一項任務，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機制設計方案。由此開啟了我之後對中國內地的多次訪問，為不同政府部門提供經濟政策的建議。

1988年，來史丹福大學訪問的清華大學呂應中教授將我介紹給時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的朱鎔基教授。朱教授邀請我擔任他所在學院的名譽教授，我欣然應允。他後來先後出任中國的常務副總理和總理職務。

1992年，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變成非常迫切的問題。在已擔任副總理的朱鎔基的支持下，國家體改委於1993年在大連就此召開了一場國際會議。我參與了會議的籌劃，並與世界銀行、樓繼偉先生、錢穎一教授及余範英女士合作，成功邀請到被公認為「臺灣經濟奇蹟之父」的李國鼎（Li Kwoh-Ting）博士參會並訪問北京。當時，李博士是1949年以來訪問中國內地的最高層級的臺灣官員。此次行程中，他受到江澤民主席與朱鎔基副總理的接見，就經濟、金融和匯率等問題發表了諮詢意見。李博士的許多建議被納入隨後的中國經濟政策與措施中。隨著宏觀經濟形勢在1994年趨於穩定，中國開啟了三項重大改革：實施匯率並軌和採納人民幣經常項目可兌換制度、金融體制改革，以及建立增值稅體系。

在1994年的墨西哥貨幣危機爆發後，我開始思考如何探測貨幣危機來臨的早期預警信號。1995年9月，我與韓國首爾西江大學的朴正洙（Jungsoo Park）教授合寫了一篇論文，提交給LINK項目（Project LINK）在南非比勒陀尼亞（Pretoria）召開的全球會議，指出泰國、南韓和菲律

賓是最容易遭遇貨幣危機的經濟體，而中國經濟較為安全。事實上，亞洲金融危機果真於1997年7月1日在泰國爆發，並很快蔓延至其他東亞經濟體。我當時向中國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應對建議，包括維持人民幣和美元的匯率不變、擴大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對出口產品實施國內增值稅全額退還等。這些建議都被政府採納，幫助中國經濟維持了穩定增長，相對無礙地渡過了危機。通過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中國政府還促進了其他東亞經濟體從此次危機中復蘇，贏得了它們的稱頌和感激。

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中國新千年的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它讓大量剩餘勞動力從第一產業（農業）轉移到第二產業（製造業、建築業和採礦業），以應對全球其他地區對中國製造品的需求增長。2018年，中美兩國之間爆發了一場貿易、投資乃至技術領域的戰爭。然而到此時，中國已不再像過去那樣依賴淨出口的擴大來促進增長，而更多轉向境內的消費和投資需求。中國政府的優先目標也從追求增長的數量變成提高增長的質量。中國經濟在未來十年保持6%的年均增長率的前景看起來相當光明。

這部關於中國經濟的論文集的關注點是經濟增長，以及宏觀經濟的戰略、政策與措施。因此，本書沒有納入由我本人單獨或合作完成的關於微觀或部門層面的中國經濟現象的其他論文，包括農業和國際貿易等領域（僅關於中美貿易戰的一篇例外，即本書第13章）。書中也沒有包含以附加值為基礎的對中美雙邊貿易收支的估算等。我希望這些論文將會被收入未來出版的文集中。

2023年11月
於中國香港

致謝

我感謝夫人劉麥嘉軒女士的時常鼓勵，以及對本書中的許多文稿的深入見解。特別感激我的導師、博士論文指導者以及半個多世紀的合作者，已故的戴爾·喬根森教授。他不僅傳授給我對經濟學研究的認識，還在2018年為這本文集撰寫了前言。感謝我的多位合作者：金鍾一 (Jong-Il Kim)、錢穎一、傑拉德·羅蘭 (Gerard Roland) 與鄭環環允許在這本文集中收錄我們共同完成的作品，與他們合作是我的榮幸。

我成年後首次訪問中國內地是在1979年，即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引領中國走向改革開放道路後不久。我很幸運地近距離見證了中國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整個過程，並有幸結識了朱鎔基總理、溫家寶總理、李克強總理、曾培炎副總理、王岐山副總理、劉鶴副總理、陳至立副委員長、陳元副主席、周小川副主席，以及其他許多中國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包括安志文、陳錫康、戴相龍、杜潤生、郭樹清、黃達、江綿恒、李劍閣、李克穆、厲以寧、林毅夫、劉國光、劉明康、樓繼偉、盧邁、汪道涵、烏家培、吳敬璉、吳曉靈、謝平、蕭夢和徐冠華等。我衷心感謝他們所有人在這些年的友誼以及在中國經濟問題上的指教。

對於本書的出版，我同樣受益於以下人士的寶貴建議、幫助、鼓勵與支持：楊振寧、邁克爾·博斯金 (Michael Boskin)、馮國釗、金耀基、廖柏偉、彼得·諾蘭 (Peter Nolan)、朴正洙、德懷特·珀金斯

(Dwight Perkins)、麥倫·舒爾茲(Myron Scholes)、米高·斯彭斯(Michael Spence)、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唐俊杰、吳素萍、熊艷艷和甄定軒。我還要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諸位同事——甘琦、林穎、葉敏磊、張煒軒和黃麗芬——在本書出版過程中的堅定投入和不懈努力。最後要衷心感謝長期以來的個人助理徐佩珍女士忠誠可靠的支持。當然，本書的所有觀點和錯漏之處均由作者全權負責，也不代表我當前或曾經供職的任何機構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資料